



本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编号：71704108）

“城镇化老人心理健康的社区环境影响因素评估及优化研究：基于‘撤村建居’的实践”的研究成果。

城镇化下中国农村社区老人 精神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



杨帆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杨帆，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香港大学哲学博士（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专业），研究方向为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及相关的社会福利政策供给。发表中英文论文十余篇。2017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及其他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课题。

本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编号：71704108）

“城镇化老人心理健康的社区环境影响因素评估及优化研究：基于‘撤村建居’的实践”的研究成果。



城镇化下中国农村社区老人 精神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

杨帆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基于城镇化的背景,从个体生命历程、家庭变迁和社区环境重构等方面探讨了影响农村社区老人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以及可行的优化改善途径。本书梳理了可用于分析城镇化与老年精神健康的关系的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对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检验。同时,书中介绍了一些国内外较为成功的提升社区老人精神健康水平的干预政策案例,并基于实证和案例分析的结果,为我国发展“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从而创造更好的农村老龄化环境提出了相关建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镇化下中国农村社区老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 / 杨帆

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313-21777-6

I. ①城… II. ①杨… III. ①农村社区-老年人-心理保健-影响因素-研究-中国 IV. ①B844.4 ②R16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73073 号

城镇化下中国农村社区老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

著 者: 杨 帆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印 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21777-6/B

定 价: 68.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1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52219025

前 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指出要牢固树立“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民生治理理念。在我国当前人口结构背景下,如何让社会政策托住亿万老年人口的“底”,既关系到每个家庭和社会成员的福祉,也关系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关于这个重要议题,学界目前达成的共识包括: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未富先老”、高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些现实情况往往被问题化,并成为各界推动老年人健康、就业、社会参与、生活质量保障等社会政策的主要动因。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城镇化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机制。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后,我国城镇化步入快车道,城镇化率迅速从1990年的不足30%提升至2018年的59.58%。未来三十年间,预计我国城镇化率将进一步提升至90%左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相当。在这一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也将同步到达顶峰水平。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将在时间和空间上共存。那么,城镇化作为一个包含着人口大规模流动、社会成员身份转变、家庭居住安排变动、社区结构重组等复杂图景的社会机制,将对中国不断老化的人口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换言之,它将建构抑或是解构老龄化问题?它将对一系列老龄化问题的解决产生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学界需要科学可靠的实证数据作为支撑,并将更多的政策关注点引向最为脆弱的社会群体。

在城镇化浪潮中,农村老年人口无疑是受影响最深的群体。首先,城镇化导致的农村青壮年大规模外流,使得我国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较之城市地区

更高。其次,城镇化还通过加大代际间的物理距离和抽离照护资源,削弱了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再次,由城镇化带来的社区社会经济结构改变、劳动习惯改变,甚至是消费文化转变等,都会放大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弱势,降低他们的生活福祉。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将城镇化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过度“问题化”。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子女在城市地区获得了更好的就业机会,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能力在总体上得到了加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老年人在住房和社会福利方面也能得到更为完善的保障;在社区重组过程中,农村老年人也能通过结成新的社区共同体而获得更多的心理和社会资源。总而言之,通过“问题化”这一个面向去考察城镇化对老龄化的影响并不可取。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通常对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和体质健康关注较多,而对他们的精神和情绪健康的关注还比较少,这尤其体现在农村老年人的研究中。导致这一缺陷的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研究者对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定位还比较低,加之农村客观物质条件所限,使得相关研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老人们的精神健康需求;二是,我国城镇化的工具理性导向容易导致政府政策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区域经济发展上,即使是民生工作也倾向于停留在物质关怀层面,而较少触及精神关怀层面。因此,在研究我国老龄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时,需要反思的根本问题是:“我们该怎样定义受城镇化影响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以及“我们的城镇化该怎样对待这些农村老年人的需求?”

201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这份纲领性文件的核心要求是建设“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而打造切实关照农村老年人需求的城镇化则是落实这一目标的题中之义。同时,让城镇化的过程不仅有利于农村老年人的物质生活,还有利于他们的精神健康则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这一目标的体现。

基于这些思考,本书确立了“城镇化对农村社区老人精神健康的影响”这一研究主题,并通过社会生态视角来构建研究的理论框架。本书主要借助了“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该数据库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研究团队建立,它是基于全国性的跟踪调查,不仅样本规模大、覆盖内

容全面、时间跨度长,而且调查数据及时开放,可免费获取。这些条件极大地促进了本研究的开展。除实证数据分析外,本书还归纳总结了国际上促进社区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先进经验,以及国内已有的颇具成效的实践性探索,目的是促进国内城镇化政策朝着对老年人更友好的方向发展。

感谢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出版资助基金的支持,使我得以将研究成果出版;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为出版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

杨 帆

2019 年 7 月 24 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中国的老龄化与城镇化	1
二、城镇化与农村老年人精神健康	3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7
四、本书的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9
第二章 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	13
一、我国城镇化的历史及类型分析	13
二、老年人精神健康的社会性影响因素	17
三、老年群体中的精神障碍问题及其不良影响	30
四、我国农村老年人的情绪问题与精神健康状况	35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数据来源	39
一、生命历程视野下的老年人精神健康	39
二、家庭环境与老年人精神健康	41
三、社区环境重构与老年人精神健康	43
四、社会生态学视角下的城镇化与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	45
五、实证数据来源	48
第四章 社会身份转变与农村社区老人的抑郁症状	50
一、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50
二、研究结果	55

三、讨论与总结	60
第五章 家庭居住安排与农村社区老人的抑郁症状	66
一、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66
二、研究结果	68
三、讨论与总结	72
第六章 社区环境重构与农村社区老人的抑郁症状	75
一、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76
二、研究结果	78
三、讨论与总结	81
第七章 促进社区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国际经验	86
一、美国的 PACE 模式	86
二、加拿大的精神健康整合照护模式	95
三、澳大利亚专业社区老年精神健康服务模式	102
第八章 城镇化背景下我国促进农村老人精神健康的政策实践	117
一、农村互助式社会养老模式	117
二、时间银行	121
三、精神健康“守门人”模式	125
第九章 结语	131
一、研究结论总结	131
二、研究的局限性	133
三、研究意涵及未来研究方向	135
附录 研究变量的编码	138
参考文献	142
索引	165

第一章 导 论

一、中国的老龄化与城镇化

在未来数十年中,老龄化与城镇化是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人口发展趋势。两大趋势将极大地型塑中国未来的面貌,而两者的交织将影响每位国人,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和身心健康状态。

一方面,我国人口正处在快速老龄化的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数据,1999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首次超过10%,正式进入人口老龄化。2005年,我国老年人口达到1.44亿,占总人口比例为11.03%。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老年人口进一步增至1.78亿,占总人口比例13.26%,是全球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而根据2019年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我国共有2.49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升至17.9%。另外,根据国家老龄委的预测,我国老年人口将在本世纪中叶达到顶峰,超过4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约1/3。

值得关注的是,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过程中,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速度较之城镇地区更快。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从超过70%下降到目前的不足50%,但是农村老年人口在全国老年人口中的占比却在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数据,全国68.2%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化比例分别为15.0%和11.7%。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在2040年之前,农村地区与城镇地区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都将持续扩大(见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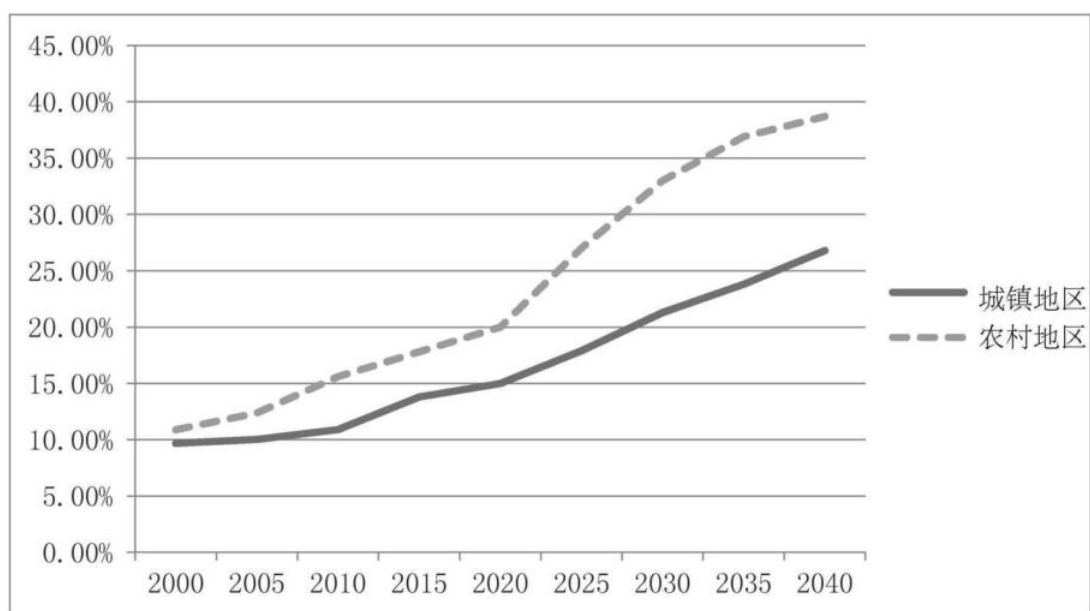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农村与城镇地区的老龄化趋势(2000—2040)

(引自李本公主编《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

另一方面,伴随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国同时在经历波澜壮阔的城镇化。当代中国的城镇化肇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即国家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之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1995 年间为我国城镇化的稳步发展期,城镇化率(即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年均提升 0.64 个百分点。在此之后,我国的城镇化开始加速,在 1996—2012 年间,城镇化率年均提升 1.39 个百分点。截至 2018 年底,我国拥有 8.31 亿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 59.58%。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要求,我国城镇化率将在 2020 年超过 60%,在本世纪中叶超过 80%。

这一人口变动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经济体制发生重大转型的反映,也成就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户籍制度松动、工业化等因素解放了农村劳动人口,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求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也为他们的流动和迁移创造了条件。根据国家农业与农村部公布的数据,2018 年第一季度,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已经超过 1.74 亿人。在许多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成为城市流动人口,这影响了劳动者作为养老义务承担者的角色,家庭赡养和对老人的生活照料功能随之被削弱。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有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空巢家庭(即不与子女同住)1 561.64 万户。

其中,农村老年空巢家庭为1 117.9万户,占老年空巢家庭总数的71.58%;农村空巢老人总数为1 632.90万,占全国空巢老人总数的69.79%。我国农村地区严峻的养老局面与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密不可分。

因此也可以说,我国人口正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高速地老龄化,且这一趋势会持续至本世纪中叶。这与全球人口结构和人口迁移的大趋势相吻合。目前全球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且这一比例会在2030年升至60%^①。与此同时,世界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将会在2050年左右升至22%,且主要集中在目前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到那时,老年人口的占比将超过这些国家的城市人口的25%^②。

二、城镇化与农村老年人精神健康

城镇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一般来说,城镇化意味着城市空间、市场和劳动力规模的扩大,而由这些所带来的在个体、家庭和社区层面的变化将可能转化为一系列影响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各个群体的精神心理健康的有利或者风险性因素^③。然而,既有研究大多关注流动人口,且多为城镇化对市民权利、社会保障以及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而城镇化对农村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的影响获得的研究关注仍然相对较少^④。

作为一个多维度的社会进程,城镇化对于个体的影响是多层面的。也就是说,在城镇化背景下,研究应该以一个生态学的视角来考察影响个体精神健康的社会性因素。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来自个体、家庭和社区层面的诸多因素都有可能影响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例如,个体层面的因素可能会包括个人社会身份的转变、体质健康以及生活方式等;家庭层面的因素可能会包括家庭

① Quinn, A. (2008). Healthy aging in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85(2), 151–153.

② WHO. (2007). *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 A guid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③ Gong, Peng, Liang, Song, Carlton, Elizabeth J, Jiang, Qingwu, Wu, Jianyong, Wang, Lei, & Remais, Justin V. (2012). Urbanisation and health in China. *The Lancet*, 379(9818), 843–852.

④ Zhang, Li. (2008). Conceptualizing China's urbanization under reforms. *Habitat International*, 32(4), 452–470.

居住安排、家庭关系以及家庭收入的变化;而社区层面的因素可能包括社区人文和物理基础设施的变化。所有这些由城镇化带来的改变都可能会对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带来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一) 个人社会身份的转变

作为一种制度性社会排斥机制,户口制度将中国人口进行了区隔,并进而又以制度福利上高低有序的形式对全部人口进行了组合。户口制度自 20 世纪 50 年代正式推出,被用于控制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地区。在此后数十年中,户口制度通过成为各种公共资源(如城乡之间的社会福利、教育和卫生服务,以及经济发展政策等)最重要的分配参照体系,而得到维系和强化。逐渐地,户口制度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二元社会结构,国民的社会身份也可以简单的分为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的持有者,但两者之间的市民权有非常显著的差异。非农业户口的持有者,尤其是那些在发达地区的市民,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拥有全面的优势。

国人的户籍身份由其父母的户籍身份和出生地的性质来决定。在改革开放以前,实现户籍转变的渠道非常有限。实现从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的渠道主要通过上大学和在城镇地区获得稳定就业职位。由于在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中的劣势,在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实现户籍转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随着改革开放后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国家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城镇地区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并且,随着对于外界信息获取渠道的拓宽,农村人口也更倾向于去城镇寻找发展机会。因此,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有几亿农村人口涌向城镇地区,他们都渴求通过劳动来改变自己既定的农村生活历程。绝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都在城镇中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收入,尽管他们的农村户籍身份并未改变,并且他们很难获得城镇地区的社会福利及其他公共资源。但是,他们之中也不乏有通过有限的渠道获得城镇户籍的人。所以,观察社会身份转变与否是考察城镇化对个体影响的有效办法,这主要是因为户籍身份是中国人口福利待遇、生活方式,以及其他社会信息的有效指标物。

(二) 家庭居住形式的改变

由于城镇化的推进,中国农村家庭的居住形式在过去数十年中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传统的多代同住模式曾经在农村地区较为普遍,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一模式逐渐式微。在 2000 至 2010 年间,我国农村地区的一代户家庭的占比从 18.21% 升至 29.77%;农村有 65 周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中的空巢家庭的占比从 20.98% 提高到 29.60%^①。同时,截至 2010 年,我国农村有 218 万家庭属于隔代家庭户,即家庭由老人和未成年的孙子女辈组成^②。

造成我国农村地区家庭居住形式发生如此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向城镇的人口流动。在 2 亿多农村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处于劳动年龄且未将家中老人带到城镇地区。这就解释了过去数十年中我国农村一代户家庭、空巢老人家庭和隔代家庭占比的大幅度提升。另外还应特别关注家庭居住形式改变对农村老年人口的影响。成年子女的离开增加了老人们在应对生活压力事件时的脆弱性,尤其会加快他们功能水平下降的速度,加强他们的精神空虚感。由于地理距离、交通成本和工作压力,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回家的频率低于每年一次^③。因此,农村老人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流动子女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还需要承担照顾留守孙子女辈的家庭责任。我国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体系还相对薄弱,这尤其体现在农村教育体系方面,这就客观上加重了农村老人教养留守孙子女的负担,教养孙子女成为农村老年人口生活压力的重要原因。

尽管学界和政策界均认可人口流动对于中国城镇化的重要性,并且对流动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人口,给予了非常多的关注,但对于农村留守的老年人口的关注却相对较少^④。对于受到城镇化影响的农村老年人口来说,家庭居住安排,尤其是与子代的物理距离,能够直接地影响他们的精神健康,或间接地通过家庭关系、家庭支持或家庭收入来影响他们的精神健康。因此,家庭居住安排是城镇化背景下影响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心理及精神福祉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 农村社区环境的重构

我国的城镇化不仅意味着各种资源在城镇地区的集聚,也伴随有城市空间

① 国家统计局(2001),《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汇总》。

② 国家统计局(2010),《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汇总》。

③ Wong, Keung, Fu, Daniel, Li, Chang Ying, & Song, He Xue. (2007).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living a marginalised lif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16(1), 32-40.

④ Zhang, Li. (2008). Conceptualizing China's urbanization under reforms. *Habitat International*, 32(4), 452-470.

和资本向原有农村地区的扩张^①。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城镇工业部门和城镇人口需要更多的物理空间来安置,而解决城镇空间问题最直截了当的做法就是从农村地区征用土地。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农村地区每年都有数百万亩土地被征用。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地区的面积在2000年至2011年间增加了74.6%^②。由于不断有新的、更加雄心勃勃的城市规划推出,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数十年内我国农村地区将有更多的土地被征用于工业或城镇建设,或直接变更为城镇地区。

在农村地区,土地是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核心。对于农村社区和农村人口来说,土地被征用是一个质的变革。从个体角度来说,失去土地的农民将不得不改变职业,从务农转向服务业或制造业部门就业,或成为无业者。他们还很可能会经历住房、生活方式、收入水平,以及其他多个方面的生活变化。从社区角度来看,征地首先会带来物理环境的变化。由于农村土地多被征用来进行工业或住房建设,所以随着征地而来的将是社区中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和文娱活动设施等的建设和升级。进一步地,社区的经济结构也将发生根本的改变,主要表现为农业经济占比的下降和工业及商业占比的上升。征地社区的社会环境也将发生改变,即从原有的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传统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以互助、业缘和兴趣团体为关系纽带的更为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然而,既有研究往往只关注农村征地社区的社会环境或物理环境中的一方面。有鉴于我国城镇化在农村社区层面的诸多表征,相关研究有必要将二者均考虑在内,并实证考察它们对受到影响的老年人口的精神心理健康的影响。

总的来说,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个体、家庭及社区层面的诸多因素都会对农村社区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产生影响。并且,个体层面最显著的社会性因素是由户籍制度所型塑的社会身份;家庭层面最显著的影响因素是由城乡人口流动所导致的家庭居住安排的变化;社区层面最显著的影响因素是由农村地区征地所带来的社区物理和社会环境的重构。也就是说,要考察城镇化对中国农村社区老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就需要特别关注社会身份转变、家庭居住安排改变,

① Deng, Xiangzheng, Huang, Jikun, Rozelle, Scott, & Uchida, Emi. (2008). Growth,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 land expansion of China.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3(1), 96-115.

② 国务院.(2014).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http://news.xinhuanet.com/city/2014-03/17/c_126276532.htm.

以及社区环境重构的作用。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一）研究目的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考察城镇化过程是如何影响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的。主要的研究关注点为个体、家庭和社区层面的社会因素对农村社区老年人口的精神症状,主要为抑郁症状的影响。同时,基于相关实证研究结果,结合国内外已有的政策实践,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基于此,本研究区分出以下三个研究子目标:

(1) 考察由城镇化导致的社会身份的变化/不变与我国农村社区老年人口的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

(2) 考察由城镇化导致的家庭居住安排的变化与我国农村社区老年人口的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

(3) 考察由城镇化导致的农村社区环境重构与我国农村社区老年人口的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意义

本研究有较为突出的理论及实证意义。在理论方面,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学界对于老年人精神健康的不同层面的影响因素的认知,即个体的生命历程、家庭的居住安排,以及社区的环境重构。首先,本研究将理顺早期生命经历(即儿童期逆境事件)与晚年生活中的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关于生命早期逆境经历与晚年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的发现还有许多矛盾之处^①。并且,目前还较少有研究会关注到在两个生命阶段之间的生活经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目前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在他们的青壮年生活阶段都经历过由

① Green, Jennifer Greif, McLaughlin, Katie A, Berglund, Patricia A, Gruber, Michael J, Sampson, Nancy A, Zaslavsky, Alan M, & Kessler, Ronald C. (2010). Childhood adversities and adult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 I: associations with first onset of DSM-IV disorder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7(2), 113 - 123.

改革开放所引发的城镇化过程,他们都是中国城镇化勃兴的见证者。因此,将个体的城镇化经历作为一个调节变量,本研究可以提供一个理顺早期生命经历与晚年精神健康的关系的有效方法和视角。

其次,本研究有助于增加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分离对于老年人口精神健康的影响的理解。现有研究主要是通过资源视角去理解与家庭成员的物理区隔与老年人的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的^①。将这样一种思路带入中国城镇化的场域,也就是说,子代流动到城镇地区会影响留守在农村地区的父代的生活支持性资源、收入和日常生活帮助资源,以及情感支持性资源。然而,由于在家庭成员分离的原因、农村家庭结构,以及老年人口在经济和文化特质方面的不同,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家庭成员间在物理上的分离可能会在不同方面或积极、或消极地影响农村社区老年人口,一个单向度的视角并不可取。

第三,本研究将加深对社区重构与老年人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大量的既有研究已经证明个体的精神健康与其所处的社区环境(如基础设施、文娱活动设施、社区基层组织等的完备程度等)密切相关^②。但是,尽管有一些研究表明社区环境的重构与社区成员精神健康的恶化有关,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更有压力的生活方式、环境污染,以及个体难以适应社区改变^③;还有其他许多研究表明社区环境重构可能会对成员的精神健康带来积极的影响,积极影响的途径包括: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教育年限、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活环境的改善,以及其他与向上社会流动相关的改变。因此,通过研究我国农村社区环境重构所带来的老年人精神健康方面的意涵,本研究能够为社区环境与老年精神健康的关系方面的理论作出相应的贡献。

同时,本研究的实证意义在于研究的结果有助于改进现有的城镇化政策,使现有政策更多地关注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精神健康。过去数十年中,我国的城镇化政策均以工具理性为导向,主要的关注点为经济发展。而基于此理念所制定的政策大多停留在物质的层面,如道路、桥梁、广场、高大上的建筑等基础设

① Hank, Karsten. (2007). Proximity and contacts between older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A European comparis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9(1), 157-173.

② Halpern, David. (2014). *Mental health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more than bricks and mortar?*: Routledge.

③ Chen, Juan, Chen, Shuo, & Landry, Pierre F. (2013). Migration, environmental hazards, and health outcome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80, 85-95.